

引文格式: 刘红红. 试论谭献的清代词史观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1 (2): 99-108.

试论谭献的清代词史观

刘红红

摘要: 作为晚清词学大家, 谭献于有清一代词史, 能够以清二十七家词人为线索梳理出清代词史的发展脉络。他将清代词人按类别分为词人之词、学人之词、才人之词三类, 标举词人之词为词学典范。谭献能客观公允评价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两大流派的功过得失。此外, 谭献视野开阔, 描述了晚清不同地域的词作风貌。谭献对清代词史的评判, 被后世奉为圭臬, 影响极为深远。

关键词: 谭献; 词史; 词人之词

作者简介: 刘红红, 文学博士, 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理工科院校中文类通识课程设置与教学实践研究”(NGJGH2019173)。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0.02.011

谭献是晚清词学大家, 他对清代词史有过深入细致的探讨: 谭献梳理了有清一代词史发展脉络, 将清代词人分为三种不同类别, 客观中肯地评价了清代重要词学流派如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功过得失, 描绘出晚清不同地域词坛的创作风貌。谭献的清代词史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笔者试图深入阐发谭献的清代词史观, 以揭示其在清代词学中的重要意义。下面逐一分析之。

一、梳理清词史发展脉络: 以二十七家词人为中心

谭献在《复堂日记》中点明了清代重要的词家二十七人: “嘉庆时, 孙月坡选七家词, 为厉樊榭(厉鹗)、林蕙槎(林蕃钟)、吴枚庵(吴翌凤)、吴穀人(吴锡麒)、郭频伽(郭麐)、汪小竹(汪潮生)、周稚圭(周之琦), 去取精审。予欲广之为前七家, 则辕文(宋征舆)、葆酚(钱芳标)、羨门(彭孙遹)、渔洋(王士禛)、梁汾(顾贞观)、容若(纳兰性德)、通声(沈丰垣), 又附舒章(李雯)、去矜(沈谦)、其年(陈维崧)为十家。后七家则皋文(张惠言)、保绪(周济)、定庵(龚自珍)、莲生(项鸿祚)、海秋(许宗衡)、鹿潭(蒋春霖)、剑人(蒋敦复), 又附翰风(张琦)、梅伯(姚燮)、少鹤(王锡振)为十家……近代诸家, 类能溯南宋而规北宋, 若孙氏与予所举二十余人, 皆乐府中高境, 三百年所未有也。”^{[1]54} 这段文字表明谭献在孙麟趾《清七家词选》所选七家词人的基础上增添前十家、后十家, 从而描绘了清代前十家、中七家、后十家共二十七家词人。《篋中词》对这二十七家词人的词作均有选录(见表1)。

表1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 谭献客观梳理了清词不同发展时期的重要词家。前十家基本代表了清初词坛的发展情况, 中七家大致代表了清代乾隆年间词坛风貌, 后十家代表了嘉道以后词

坛的创作情况。其二,前中后的三段分期基本囊括了清代重要流派的代表词人。前十家词人涉及清初的云间词派(宋征舆、李雯及以沈谦为代表的云间词派的余响),广陵词坛的代表人物(王士禛、彭孙遹),阳羨词派的代表词人陈维崧,抒发性灵的纳兰性德、顾贞观等词人。中七家词人基本上为浙西词派的代表人物(厉鹗、林蕃钟、吴翌凤、吴锡麒、郭麐)。后十家以常州词派为主,张惠言、周济、龚自珍、许宗衡、张琦、王锡振、蒋敦复均为常州派词人。其三,从所选词作数量可知,谭献在清词家中推崇纳兰性德(25首)、蒋春霖(23首)、项鸿祚(21首)。在谭献看来,清代词人成就最高的不是常派词人,也不是浙派词人,而是有“词人之词”称谓的纳兰性德、蒋春霖、项鸿祚三人。

表1 《篋中词》所选清代二十七家词人词作数量统计

分期	流派	词家	词作数量/首	备注
前十家	云间词派	宋征舆	8	
	云间词派	李雯	8	
	云间词派余响	沈谦	7	西泠十子之一
	广陵词坛词人	王士禛	8	才人之词
	广陵词坛词人	彭孙遹	8	
	阳羨词派	陈维崧	9	
		纳兰性德	25	词人之词
		顾贞观	5	独抒性灵
		钱芳标	10	有黍离之伤,才人之词
中七家		沈丰垣	8	有黍离之伤
	浙西词派	厉鹗	18	乾隆词坛
	浙西词派	吴翌凤	8	枚庵高朗
	浙西词派	郭麐	6	频伽清疏
	浙西词派	吴锡麒	2	词学樊榭
	浙西词派	林蕃钟	7	宗法浙西词派
		汪潮生	7	东巢词深入宋贤之室
		周之琦	5	截断众流
后十家	常州词派	张惠言	10	学人之词
	常州词派	周济	10	学人之词
	常州词派	龚自珍	6	
	常州词派	许宗衡	5	近词一大宗
	常州词派	张琦	3	
	常州词派	王锡振	4	
	常州词派	蒋敦复	4	
		项鸿祚	21	词人之词
		蒋春霖	23	词人之词
	浙西词派	姚燹	2	

二、标举词人之词为词学典范

谭献之前，王士禛《倚声集序》划分词人流别：“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2]王士禛将词人类型划分为诗人之词、文人之词、词人之词、英雄之词四类。王士禛对于词人类别的划分对谭献词人之词、学人之词、才人之词的区分或有启发。

（一）词人之词、学人之词、才人之词的划分

谭献在《篋中词》中有一段关于词人之词、学人之词、才人之词的表述：

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或曰：“何以与成、项并论？”应之曰：“阮亭、葆汾一流，为才人之词；宛邻、止庵一派，为学人之词；惟三家是词人之词，与朱、厉同工异曲，其他则旁流羽翼而已。”^{[3]186}

这段文字大致有两点含义：其一，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区分出才人之词、学人之词、词人之词三种不同类型的词。大致说来，“才人之词”专指诗才而言，以作诗为主，词为诗之余事，或可理解为用作诗之法作词。如王士禛（神韵派）、钱芳标（云间诗派）的主要身份是诗人，其词作不免体现其诗才。“学人之词”专指经史学者而言，以学问为词，如张惠言、周济的主要身份是经史学家，其词作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创作者的胸襟学问。“词人之词”，专意填词，在词风上“追求本色，情感丰富，哀感顽艳，极缠绵婉约之致”^[4]。如纳兰性德、项鸿祚、蒋春霖三家以情韵取胜，哀怨动人，且仅以词知名，谭献特称之为“词人之词”。其二，评判三类词艺术水平的高低。在谭献看来，词人之词成就最高，才人之词、学人之词为“旁流羽翼”，在艺术上次于词人之词。谭献《篋中词》对三类词人的词作均有选录，但从数量上可看出谭献的倾向（见表2）。

从表2可知，首先，谭献选录数量最多的词人是纳兰性德、蒋春霖、项鸿祚，这三人正是词人之词的代表。其次，选录数量较多的词人是朱彝尊、厉鹗，各十八首。谭献肯定其成就，认为这二人与词人之词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同时认为他们的词作仍有瑕疵。谭献云：“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到。”^{[3]52}他指出，朱彝尊词情感深沉，有类似词人之词的一面，但同时其词存在琐屑短钉的不足。谭献评厉鹗词云：“太鸿思力可到清真，苦为玉田所累。”^{[3]67}“填词至太鸿，真可分中仙、梦窗之席，世人争赏其短钉窳弱之作，所谓‘微之识砭砭也’。”^{[3]71}这里谭献极力辩驳世俗对厉鹗词的刻板印象，欣赏其思

表2 《篋中词》三类词人词作选录数量统计

词作类别	词人	词作数量/首
词人之词	纳兰性德	25
	蒋春霖	23
	项鸿祚	21
类似词人之词	厉鹗	18
	朱彝尊	18
学人之词	张惠言	10
	周济	10
	龚自珍	6
	张琦	3
才人之词	钱芳标	10
	王士禛	8

力似周邦彦,但“苦为玉田所累”一语表明谭献对其仍有微词。可见,谭献认为朱彝尊、厉鹗之词优劣互见,不够精美纯粹,故在总体成就上屈居纳兰性德、蒋春霖、项鸿祚三家词之下。最后,谭献在学人之词、才人之词的选录数量上明显低于词人之词,可见谭献对词人之词的推崇。除此之外,谭献还在《复堂日记》中表现出他对纳兰性德、蒋春霖、项鸿祚词的称扬:

点诵成容若《饮水词》袁兰生选本。风格更高出蒋鹿潭矣。有明以来词手,湘真第一,饮水次之,陈(其年)、朱(竹垞)而下皆小家也。^{[1]233}

赞侯钞示蒋鹿潭未刻词十余首,甚工,百年来真无第二手也。^{[1]265}

杭州填词,为姜、张所缚。偶谈五代北宋,辄以空套抹杀。百年来,屈指惟项莲生有真气耳。^{[1]34}

谭献认为,明清以来,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仅次于陈子龙词,宜为清词第一;蒋春霖词百年来“无第二手”;项鸿祚词“有真气”。从这些评语明显可以看出谭献对三家之词的高度肯定。

(二) 词人之词的特点

谭献认为纳兰性德、蒋春霖、项鸿祚词三足鼎立,为词人之词的典范。三家词具有两方面的共同特征:

其一,三家词的共同点是抒情写意,表现伤心人的别有怀抱,有忧生念乱的意识。谭献评价项鸿祚云:“百年来,屈指惟项莲生有真气”^{[1]34}，“莲生古之伤心人也。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无古人”^{[3]142}。谭献强调项鸿祚词“有真气”，是古之伤心人，“其实也就是词人的赤子之心，出之于自然流露，不必靠学问堆砌起来的，而伤心的原因则是源于世变乱离、精神上缺乏出路”^[5]。谭献又言：“以成容若之贵、项莲生之富，而填词皆幽艳哀断，异曲同工，所谓别有怀抱者也。”^{[3]142}他认为纳兰性德与项鸿祚词的共同点是都抒发了个人抑郁、伤感的怀抱。蒋春霖、纳兰性德、项鸿祚三人词作均表现了凄楚的心境。谭献评蒋春霖云：“《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3]186}蒋春霖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的时代乱离，其词作真实反映了战争之残酷、百姓之苦难，抒发了一种深沉的末世之悲。词作风格沉郁顿挫，艺术感染力极强。总之，三家之词皆表现性情襟抱，以情韵取胜，哀怨动人，“项鸿祚论词有艳、苦、郁、深之说，纳兰性德重视忧患意识，蒋春霖词则仿效杜诗反映战乱之作，忠爱之情自然流露，更将词中的沉郁意蕴发挥得淋漓尽致”^[5]。

其二，三家词都具有南唐、北宋词的气韵神貌，体现出谭献对南唐、北宋词风的推崇。谭献评纳兰词云：“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残唐坠绪，绝而复续。”^{[3]26}他高度肯定了纳兰小令的成就，认为其小令韵味悠长、缠绵婉约，有南唐词的韵味。又谭献评项鸿祚《忆云词》云：“莲生仰窥北宋，而天赋殊近南唐。《丁稿》一卷，遍和五代词，合者果无愧色。”^{[1]37}这也点明了项鸿祚词具有南唐北宋风貌。对于蒋春霖《水云楼词》，谭献评曰：“婉约深至，时造虚浑，要为第一流矣。”^{[1]37}又评其《南浦·春草》词云：“南唐之骨，北宋之神，此才独擅。”^{[3]181}这表明蒋春霖词亦具有南唐北宋词之风神。

三、公允评价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功过得失

谭献对清词史上的重要词人能够客观评价其得失，既肯定其合理之处，又指出其存在的偏

颇。“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到。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3]52}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由陈维崧开创的阳羨词派、朱彝尊开创的浙西词派在清代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直至嘉庆年间常州词派走上词坛之前。其二，谭献客观评价了朱彝尊与陈维崧词作的得失，朱彝尊词情感深沉却伤于琐碎，陈维崧用笔厚重却有粗率之失。谭献既能客观公允评价朱彝尊、陈维崧创作的得失，又能以持平之语评价浙派、常派的功过得失。他曾言：“常州派兴，虽不无皮傅，而比兴渐盛。故以浙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流为江湖。以常派挽朱、厉、吴、郭佻染短钉之失，而流为学究。”^{[1]72}这里，谭献既肯定了浙派倡导的“醇雅”对拯救清初淫曼词风的作用，也肯定了常派倡导的“比兴寄托”对挽救浙派短钉之失的功绩。同时，他也看到了浙派、常派各自的弊病。浙派词的流弊在于油滑轻佻，琐屑堆砌，缺乏真情实感；而常派词的弱点在于隐晦机械，有学人之词“平钝廓落”之弊。这些都体现了谭献作为常州词派理论批评家不囿于宗派之见而能实事求是的可贵之处。周庆云《历代两浙词人小传》于谭献小传下云：“论词尤有元解……于浙中词派、常州词派之流别，剖析毫芒。”^[6]具体说来，谭献对浙派、常派均有正反评价。下面详细分析之。

（一）谭献既批评浙派局限于学习南宋，有空疏浮滑之弊，又肯定其拯救清初淫曼词风的历史功绩

其一，谭献对浙派词学主张从四方面予以评说。首先，谭献批评浙派仅局限于学习南宋姜夔、张炎。“阅王氏《词综》……王侍郎去取之旨，本之朱锡鬯，而鲜妍修饰，徒拾南渡之浑。以石帚、玉田为极轨。不独珠玉、六一、淮海、清真皆成绝响，即中仙、梦窗深处，全未窥见。”^{[1]72}谭献指出王昶《国朝词综》只局限于推举姜夔、张炎，未曾注目于北宋。实则北宋词人及南宋吴文英、王沂孙也有可学之处。嘉庆年间，常州词派登上词坛之后，对浙派只学南宋姜夔、张炎的局限进行了纠正。“填词至嘉庆，俳谐之病已净。即蔓衍阐缓，貌似南宋之习，明者亦渐知其非……近时颇有人讲南唐北宋，清真、梦窗、中仙之绪既昌，玉田、石帚渐为已陈之刍狗。”^{[1]72}谭献指出浙派学南宋姜夔、张炎，倡导清空醇雅之风，而流于空疏枯寂之弊。而补偏救弊的常派崇尚南唐北宋词，讲求比兴寄托，以丰富词作意涵。其次，谭献批评浙派学习姜夔、张炎的清空而未学得姜夔的幽涩、张炎的圆润。“浙派为人诟病，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涩，玉田之润。”^{[3]71}再次，谭献批评浙派碎屑短钉，空疏浮滑，于寄意处有所忽略。“南宋词敝，琐屑短钉。朱、厉二家，学之者流为寒乞。”^{[3]92}“《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3]71}最后，谭献对浙派的长处予以肯定。谭献对浙派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修正给予肯定：“枚庵高朗，频伽清疏，浙派为之一变。”^{[3]92}此外谭献在《篋中词》中表现出对浙派推尊的“清空”说的认同。如评方濬颐《垂杨》（春来忆远）云：“清空如话。”^{[3]251}评万钊《酷相思·忆鹤涧》云：“涧民诗人之词，清空不质实。”^{[3]341}评刘炳照《梅子黄时雨》（无数楼台）云：“词赋本意，清空幽袅，直到古人。”^{[3]353}评顾贞观《南乡子·捣衣》云：“清空若拭。”^{[3]21}评厉鹗《声声慢·停琴仕女图》云：“如此方是清空不质实。”^{[3]71}评庄棫《凤凰台上忆吹箫》（瓜渚烟消）云：“清空如话。不至轻靡，消息甚微。”^{[3]212}评贺双卿《惜黄花慢·孤雁》云：“清空一气如拭。”^{[3]220}评王鹏运《齐天乐·秋光》云：“野云孤飞，去来无迹。”^{[3]345}评王嵩《满庭芳》（中酒心情）云：“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妙在语言之外。”^{[3]73}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谭献或直接以“清空”二字表明词作特点，或以“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譬喻词作具有清空

词境；二是谭献评价的有“清空”特点的词人，浙西词人仅厉鹗一人，其他则为非浙派词人。这表明“清空”非浙派词人的专属，“清空”作为一种词境，具有遗貌取神、寄意于象外的特点。

其二，谭献对浙派《词综》系列词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评价。《词综》是朱彝尊、汪森精心编纂的一部大型词选，以醇雅为选录标准，为推行浙西词派的词论主张服务。《词综》产生之后，形成了一个以《词综》为选系的词选，它们分别是王昶《国朝词综》、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丁绍仪《国朝词综补》、黄霁青《续词综》、陶梁《词综补遗》等。据谭献的评价，《词综》系列词选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首先，以《词综》为准则，以补遗和续编《词综》为宗旨。“阅王氏《词综》四十八卷，二集八卷，王侍郎去取之旨，本之朱锡鬯。”^{[1]72}“阅无锡丁绍仪杏舫《国朝词综补》稿本。扬王昶侍郎之波。”^{[1]5}其次，大都卷帙浩繁，以补人补词为主，佳篇不多。如王昶《国朝词综》四十八卷，二集八卷，共五十六卷；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丁绍仪《国朝词综补》五十八卷，续编十八卷，共七十六卷；黄霁青《续词综》二十四卷；陶梁《词综补遗》二十卷。这些系列词选的编纂目的在于补人补词，谭献言：“借丁杏舫选《词综补》四十卷归阅。丁氏意在备人，补王氏《词综》、黄氏《续词综》所未及，故佳篇不多觐也。”^{[1]319}又《复堂日记》载：“录丁杏舫《词综补》……用补人补词例，搜辑至四十卷，可谓勤矣。惟以意在补人，不无泛滥。”^{[1]319}再次，校勘不精，舛误颇多。如谭献指出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将张孝祥《念奴娇·洞庭》作丹阳荆播《念奴娇·洞庭》之误：“书肆取《词综续编》回……卷一载丹阳荆播《念奴娇·洞庭》词，即张于湖‘洞庭青草’一阙，不知何以误入。于湖此词南宋最有名，《绝妙好词》且首列。二黄公必非未寓目者，可异。”^{[1]265}又，丁绍仪《国朝词综补》错误、重复处较多：“校丁氏《词综补》……意在博采，去取无义例，而舛迕复重尤多。颇以为恶札，但记名姓而已。”^{[1]332}最后，由于这些词选意在补人补词，保存了丰富的词作，故谭献以这些词选作为选源，选录词作入《篋中词》。如谭献从丁绍仪《国朝词综补》中选录词作入《篋中词》。《篋中词》对此有所记录：“前卷刻成，祥符周季貍以丁氏词编已刻之四十一卷至五十八卷，又未刻写本十八卷属校，复采获二十余调如右。”^{[3]289}“三十年前客闽，与无锡丁君杏舫相识，君方纂《词综补编》……丁君书刻于吴中，四十卷中著录千余人，予掇篋中未备者，别裁续录如右。”^{[3]299}这两条材料表明谭献先后两次从《国朝词综补》中辑录词作入《篋中词》。除了《国朝词综补》外，谭献还选录《国朝词综续编》词作入《篋中词》。谭献从《国朝词综续编》辑得三首词作入《篋中词》。“茗柯词四十六首久欲评注全本，遗饷学子，病懒未就。今就《宛邻词选》附录及《词综续编》所采，合录十阙，菁华略备。”^{[3]102}谭献采录了《国朝词综续编》所选张惠言《相见欢》（年年负却花期）、《木兰花慢》（是春魂一缕）、《玉楼春》（一春长放秋千静）三首与《宛邻词选》附录张惠言七首词作入《篋中词》，这十首词作基本体现了张惠言词的精华所在。

（二）谭献既肯定了常州词派的尊体及比兴寄托的理论价值，又指出常派存在学问有余、性情不足之弊端

首先，谭献评说常州词派的理论主张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称扬常派推尊词体。他肯定了张惠言、张琦为提高词体地位做出的贡献：“倚声之学，由二张而始尊耳。”^{[3]103}同时称扬周济传承二张尊体之说，使词取得与诗、赋、文辞相同的地位：“周氏撰定《词辨》《宋四家词筏》，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此道遂与于著作之林，与诗赋文笔同其正变也。”^{[3]113}其二，肯定常派比兴

寄托的理论价值。“常州派兴，虽不无皮傅，而比兴渐盛。”^{[1]72}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理论，注重词作的思想意涵，可以医治浙派末流琐屑恒订、空疏油滑之弊。“以常派挽朱、厉、吴、郭佻染恒订之失”^{[1]72}肯定了常派比兴之论对于纠正浙派末流俳谐之病、曼衍之习的功绩。谭献对周济“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观点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它不仅适用于词的创作，也是其他文学体裁应遵循的普遍规律。“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独填词为然！”^{[1]65}其三，勾勒出常州词派的师承谱系，阐明常州词派由张惠言、张琦发端，经过董士锡，再传到周济的师承谱系：“《茗柯词选》出，倚声之学日趋正鹄。张氏甥董晋卿，造微踵美，予未得其全集。止庵切磋于晋卿，而持论益精……止庵自为词精密纯正，与茗柯把臂入林。”^{[3]113}张惠言、张琦是兄弟，董士锡是张惠言的外甥，常州词派的传承由张惠言、张琦到董士锡，主要通过亲缘关系。周济为董士锡友人，与董士锡交流切磋，受其影响，以“比兴寄托”之说传承张惠言“意内言外”说，发展壮大了常州词派。常州词派由董士锡到周济的传承，不同于前期的亲缘传承，而是学缘传承，体现了常派词学传承路径的拓展。其四，指出常派存在牵强附会及学问有余、性情不足之弊。谭献指出，常州词派的弊病之一是由于强调比兴寄托，强求微言大义，易流于牵强附会；常州词派的弊病之二是“平钝廓落”^{[3]109}，“这是由于常州派言比兴而少论词境，谈寄托而少及性情”^[7]。常派词人多为学者，长于深厚沉婉，富于词作内涵，是为“学人之词”。而不善学者，过求幽折，指向不明，致使读者无从把握其意，缺乏灵气与个体真性情。谭献作为常州词派中人，对常派弊病没有回护，而是客观指出不足，其词评颇为公允。

其次，谭献评价常州词派词选的词学观点表现在三个方面。谭献对常州词派词选诸如张惠言、张琦《宛陵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张曜孙《同声集》，刘逢禄《词雅》等均有评点，大致表现为三点：其一，指出比兴寄托是常州词派词选的选词宗旨。《宛陵词选》以比兴寄托为选词标准，周济《宋四家词选》是“以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作为标尺的门径词选，“陈义甚高，胜于宛陵《词选》”^{[1]65}。张曜孙《同声集》收道光、咸丰间词人九家，“以继《宛陵词选》。深美閼约之旨未坠，而佻巧奋末者自熄”^{[3]346}。刘逢禄“尝撰《词雅》五卷八十家三百首，《自叙》以为：‘唐、五代、宋氏所传，才士名卿閼意眇指，正变声律具矣’……《词雅》一编，不知传写尚有其人否？”^{[3]266}刘逢禄《词雅》今不传，但从其《自叙》所言“閼意眇指”之语可见其选词宗旨与张惠言相近。其二，表明常州词派词选出于宗派需要，标举北宋词。基于这个原因，谭献对《宛陵词选》赋予了更多内涵。“如认为张惠言的《词选》出于创常州派、取浙派而代之的明确意识，并认为张氏之论皆与浙西词派相对立。”^[8]“翰丰（张琦）与哲兄同撰《宛陵词选》，虽町畦未尽，而奥窔始开。其所自为，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绪。”^{[3]103}这里谭献认为张惠言有意标举北宋，以与浙派推崇南宋相对立。其三，对常派词选的不足有所揭示。如潘德舆批评张惠言《词选》选词过于严苛，有遗珠之憾，如五代北宋词“宏音雅调”，却“多被排摈”。谭献对潘德舆这一批评表示赞同，认为“其针砭张氏，亦是诤友”^{[3]118}。换言之，谭献也认为张惠言《词选》选词存在偏狭之处。谭献认为《宋四家词选》词作多取材于朱彝尊《词综》，不够广泛。“检阅周止庵《宋四家词选》。皆取之竹垞《词综》，出其外仅二三篇。”^{[1]299}又认为《同声集》一意追随《宛陵词选》，有“平钝雷同”^{[3]346}之誉。谭献的词学宗尚倾向于常州词派，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既肯定常派的功绩，又指出常派的不足，这是他高于常州词派其他词人的地方。

四、描述晚清不同地域的词作风貌

谭献《篋中词》梳理了清词史的发展脉络,除了对清代有影响的词派诸如阳羨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得失有所评价之外,对于晚清诸如岭南(粤东、粤西)、闽中、湖湘等不同地域的词坛风貌,谭献均有评定。

其一,对粤东词人的创作情况有所描绘。“岭南文学,流派最正……填词有陈兰甫先生,文儒蔚起,导扬正声。叶南雪为春兰,沈伯眉为秋菊,婆婆二老,并秀一时。约梁君星海将合二集,益以寓贤汪玉泉,为《粤三家词》云。”^{[3]303}这里谭献勾勒了粤东词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澧、梁鼎芬(陈澧入室弟子)以及有“粤三家词人”之称的叶衍兰(号南雪)、沈世良(字伯眉)、汪琬(字玉泉)。谭献对陈澧词风有所概括:“兰甫先生,孙卿、仲舒之流,文而又儒,粹然大师,不废藻咏,填词朗诣,洋洋乎会于风雅,乃使绮靡、奋厉两宗,废然知反。”^{[3]296}这里谭献将陈澧比作荀子、董仲舒之类的学者,陈澧以文儒身份作词,是为学人之词。同时陈澧在粤东是开疆拓土、引领词学风雅之气的人物。“东塾先生(陈澧),文而又儒,开示承学。”^{[9]1793}谭献认为“粤三家词人”是继陈澧之后广东词坛能传承风雅精神的词人,“接武三家,比物比志。绮藻丽密,意内而言外;疏放豪逸,陈古以刺今”^{[9]1793}。谭献曾应叶衍兰之请,参与《粤三家词钞》篇目的选定工作。“叶兰台属选《岭南三家词》,为沈伯眉、汪玉泉及兰翁,今日始就。审定圈识,写目录寄去。沈为《楞华馆词》,汪为《随山馆词》,叶为《秋梦庵词》。”^{[1]371}并且谭献作有《粤东三家词钞序》,对三家词分别做出评价:“佩玉千声,流水九曲。书艺正宗,逆入平出。此楞华之谛也。送远碧草,登楼青山。目之所际,春秋佳色。此随山之珍也。锦瑟幽忆,奇珠转圜。徘徊徘徊,采诗入乐。此秋梦之禅也。”^{[9]1793}沈世良《楞华馆词》如书法作品一般,具有萧疏的名士气息。汪琬《随山馆词》意境开阔,多记录其游幕经历。叶衍兰《秋梦庵词》悼亡之作较多,这些词作“将哀怨的心曲表现得婉曲幽深”^[10]。

其二,对粤西词人创作情形有所总结。谭献《秋梦庵词钞序》云:“献投老以来,同声斯应。岭表贤达,天涯素心。东有汪芙生、沈伯眉,望风怀思;西有王幼遐、况夔笙,抚尘结契。池波共皱,井水能歌。出门有必合之车,异曲有同工之奏。”^{[9]1669}这段文字表明晚清岭南词坛,粤东有汪琬、沈世良、叶衍兰等词人,粤西则有王鹏运、况周颐等词人与之遥相呼应。谭献总结王鹏运、况周颐词作风格云:“幼遐絮精、夔笙隐秀,将冶南北宋而一之,正恐前贤畏后生也”^{[3]346},对其从南北宋之争中解脱出来,而走向将南北宋熔铸的词学观极为称颂。除了王鹏运、况周颐这两位著名的粤西词人外,谭献对于在王鹏运、况周颐之前有影响的粤西词人苏汝谦、王锡振也给予肯定:“桂林山水奇丽,唐画宋词之境,苏君(苏汝谦)超超,非少鹤(王锡振)丈所能掩,亦不负灵区矣。后起有王幼遐、况夔笙,宫商举应,伶翟争传已。”^{[3]339}至此,谭献勾勒出粤西词人的代表,即苏汝谦、王锡振、王鹏运、况周颐等人。

其三,对晚清闽中以谢章铤为首的聚红榭词社的创作风貌有所描绘。“闽中词人,道咸间唱和颇盛。予在闽所识,如刘赞轩、谢枚如辈,皆作手也。社集有《聚红榭诗词》之刻。”^{[3]240}“阅《聚红榭雅集诗词》。《聚红榭》者,闽中社集合刻所作,长乐谢枚如持赠……枚如社中巨手,词

入能品。徐云汀、李星汀亦高出辈流。”^{[1]11} 这里谭献提及闽中词人谢章铤、刘勣、徐云汀、李星汀结社，社集为《聚红榭诗词》，故又名“聚红榭词社”，其中以谢章铤成就最高。谭献又总结闽中聚红榭词社的词学宗尚为高扬苏辛豪放之词风。“闽中《聚红榭雅集诗词》倚声似扬辛、刘之波。惟枚如多振奇独造语，赞轩（刘勣）较和婉入律。”^{[1]186}

其四，对易顺鼎、程颂万等为代表的湘社词坛的创作情况有所述及。《复堂日记》载，光绪十七年（1891），“宁乡程颂万子大，在长沙联湘社唱酬，如二易、何、王，英英侠少。而吾友江夏郑湛侯，以风尘吏虱其间，刻行《湘社集》”^{[1]198}。这条材料表明，光绪十七年（1891），湘社在长沙成立，程颂万为发起人，参与湘社的成员有程颂万、易顺鼎、易顺豫、何维棣、王景峨、王景松、郑襄等，其社集为《湘社集》。谭献评云：“湘社词人，齐驱掉鞅，子大芳兰竞体，骚雅芬菲。”^{[3]348} “易氏二妙，倚声家之丁、陆矣。”^{[3]285} 此外，谭献还关注到某一地域有影响的群体，如清代道光年间江苏吴江的陈寿熊、杨秉桂、沈曰富三人，谭献称其为“吴江三家，学行敦茂，文辞尔雅。寓兴长短句，是为绪余，是为正轨”^{[3]318}。又如宗山、边葆枢、吴唐林、邓嘉纯、俞廷瑛合刻的《侯鯖词》，在杭州一带传唱，颇有影响。故谭献对这五人的词作予以选录。“以上五家（宗山、边葆枢、吴唐林、邓嘉纯、俞廷瑛）合刻《侯鯖词》，传唱西泠。”^{[3]273}

五、结语

谭献以公正中肯的态度评定了有清一代有影响的词家词派，其影响极为深远，有些评价几成定论，被当时和后来的词学界普遍接受并广为沿用。谭献对清词的评语成为后世词史、词学史、文学史评价清词的圭臬。如民国时期张振鏞《中国文学史分论·叙词》：

他若番禺叶衍兰南雪之《秋梦庵词》，以绮密隐秀称；旌德江顺诒秋珊之《愿为明镜室词》，以婉润称；会稽李慈铭菴客之《霞川花隐词》，以清峻爽拔称；番禺陈澧兰甫之《忆江南馆词》，以温厚和宛称；平湖张金镛海门之《绛趺山馆词》，以清微窈妙称；上元许宗衡海秋之《玉井山房诗余》，以幽窈绮密称；钱塘张景祁蓊甫之《新蘅词》，以精研音律称；阳湖刘炳照光珊之《留云借月庵词》，以细意熨贴称；秀水沈景修寒柯之《井华词》，以凄婉称。此皆清季文人之以词名者也。^[11]

这里对清代词人词作的评点，多取资于谭献《篋中词》《复堂日记》中对相关词人词作的评语。此外，民国时期有关清词评价的词话著作也受到谭献的影响。如冯秋雪《冰簃词话》云：

词之有宋，犹诗之有唐。有清一代，词学大昌，集宋之成者也……纳兰容若，则升南唐二主之堂；朱竹垞、陈其年、厉樊榭也，则容与乎白石、梅溪、玉田、梦窗之间……张皋文则集两宋之精英，开词家未有之境；项莲生则从白石、玉田、梦窗而超出其外；龚璁人则合周、辛一炉而冶，作飞仙剑侠之音；蒋鹿潭则与竹垞、樊榭异曲同工，胜朝杜工部也。鹿潭而后，虽有作者，然大都从字句间雕琢，有辞无气，过此目往，恐成广陵散矣。^[12]

冯秋雪这里对纳兰性德、张惠言、项鸿祚、龚自珍、蒋春霖等清词家的评价，明显可见化用谭献评语的痕迹，这恰说明谭献对清词评点的精准。

参考文献:

- [1] 谭献. 复堂日记 [M]. 范旭仑, 牟晓朋, 整理.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2]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134 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231.
- [3] 谭献. 清词一千首 篋中词 [M]. 罗仲鼎, 俞浣萍, 校点.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7.
- [4] 沙先一, 张晖. 清词的传承与开拓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50.
- [5] 黄坤尧. 清词三大家与“词人之词”的审美变异 [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44 (5): 56-66.
- [6] 周庆云. 历代两浙词人小传 [M]. 方田, 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293.
- [7] 邱世友. 词论史论稿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336.
- [8] 孙克强. 清代词学批评史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271.
- [9] 冯乾. 清词序跋汇编: 第四册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3.
- [10] 左鹏军. 岭南学: 第三辑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85.
- [11] 张振鏞. 中国文学史分论: 第一册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118.
- [12] 杨传庆, 和希林. 辑校民国词话三十种 [M]. 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16: 107.

On Tan Xian's Views of the History of Ci in the Qing Dynasty

Liu Honghong

Abstract: As a master of Ci poet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n the history of Ci in the Qing Dynasty, Tan Xian sorted 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Ci in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clues of 27 Ci poets in the Qing Dynasty. Tan Xian divided Ci in the Qing Dynasty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Ci written by Ci poets, Ci written by scholars and Ci written by the gifted and set the first as a model. Tan Xian offered an objective and fair evaluation of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wo Ci schools in Zhexi and Changzhou. Besides, Tan Xian described Ci styl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a broad perspective. Tan Xian's judgments on the history of Ci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regarded as a criterion by the later generations with profound influences.

Keywords: Tan Xian; the history of ci; Ci written by Ci poets

(收稿日期: 2019-07-26; 责任编辑: 陈鸿)